

舊遊往事(一)

周蜀雲

大夏大學教書記

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抗戰爆發，上海著名的兩所私立大學——復旦與大夏，在戰事開始時即隨政府西遷；初期兩校聯合，後來復旦在重慶的北碚，大夏在貴州的貴陽分別覓址安定下來，繼續招生上課。

客裏家庭重作主婦

那時我和外子徐漢豪各自爲了職業，分處兩地，相隔千里。他早來大夏大學任教，過着單身生活，而我則在四川綿陽與母親和兩妹住在一起，安了一個形式上的「家」。我彷彿成了一個待字閨中的大小姐，沒有一個人叫我是「徐太太」的；我爲了與夫婿會合團聚乃於二十七年十月轉來貴陽，建立了一個客裏家庭，重作主婦，算是「復職」了。但我此來貴陽，不僅是來當「太太」而已，還有一個職位候我已久，到貴陽兩三天後，一切私事摒擋就緒，就又重登講壇，開始回復我的教授生活。這時聘我任教的大夏大學，雖是初到，並不陌生，我與「它」有着久遠的歷史淵源。十餘年前我還未出國留學時，曾一度肄業大夏，後來爲了戰事才轉學北大。我回國後第一個聘我

教書的也是大夏，不料當時因一二八淞滬戰事，遷延數月，以致錯過機會，所以大夏大學與我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到大夏授課除校長已非我十餘年前在校時的馬君武博士以外，幾個主要的負責人，如現任校長王伯羣先生是我在校當學生時的董事長，副校長歐元懷是我當年的業師，教務長吳澤霖博士是老同志而兼好朋友陸德晉姊的夫婿，訓導長王裕凱博士亦是當年老同志，教職員多是昔年同窗熟友。漢豪之所以被大夏聞名禮聘，早我到校任教，與大夏之爲我母校，亦爲原因之一。我能在四川脫身，回到母校任教，是我引爲非常愉快而符合理想的事，故我十分欣幸。

我到達的第二天，漢豪就從學校携回我的聘書交給我，這是早就談妥，等候我到了即發出的，聘書上寫明聘我爲法學院專任教授。擔任的課程是憲法、國際公法、政治學和外交史四門，都是法學院政治系的課程，其中有兩門早已由漢豪和吳澄華自學期開始即分別替我代授；另兩門，因學生參加軍訓兩月，直到我來時，恰好他們訓畢返校，由我自行開講，不因我之遲到，影響該學期中我分內的課程。

當我走到學校的大門口，遠遠望見大夏大學四字校牌，立刻觸發了我一連串的思想。首先使我想到了民國十五年在重慶當學生時的種種往事。那時，學校在上海膠州路，是一座三層大洋樓，門前是綠蔭夾道的柏油馬路；而今遷來貴陽，借用講武堂舊址，一座四合院的平房，占地雖然廣闊，內部也經修整，但其氣派就不能與上海的膠州路學舍相比，更不能與遷校前在上海梵王渡新建的，規模更大、設備更完美堂皇的學府相比。梵王渡新校園我去過若干次，是我親眼見過的。而今借用貴陽講武堂，祇能說在本地算是一個寬宏廣大的所在，若非校長王伯羣是革命元老，黔省巨紳，還無法借用到此一大片地方。當時貴陽各機關學校除原有者不計外，凡中央或由省外遷來的機構，要以大夏大學所占用的講武堂爲最寬做、最具規模的大學校舍了。

最具規模的大學校

進入學校大門，四面觀望，周圍皆是整齊齊的平房，兩邊是教室，對着大門正中一排是各單位辦公室，中間一大塊長方形的空場，還可作

為球場，場邊綠樹疏落，頗有韻致。靠辦公室一邊的場角，有一棵朱沙梅，時屆嚴冬，正開得鮮艷而有精神，為偌大的園子增色不少。本來覺得這所講武堂舊址有些乾燥枯索，一見那株紅梅與場邊的一些綠樹，眼睛為之一亮，心田中也感覺有幾分滋潤了。這個長方形大院，進門一目了然，並無曲折，這是我第一天到校的印象。

我國一向重視師道，古時家長為子女延師課讀，尊稱老師為西席，而主人自謙為東主。到了近代的學校——尤其大學——學校聘請教員，皆用聘書寫明「敦聘某某為……」，可見教師與校長間是賓主關係，處於平等地位，非如行政機關之長官與屬員間有上下隸屬關係可比。我此番被聘來校任教，在法理上自是賓主情誼，可是我昔日曾在大夏當過學生，今之校長與副校長都是我的老師，故我到校拜會他們時，仍執弟子禮。久違師門，一朝在此客地相逢，師生的感情格外顯得興奮熱烈，彼此面上充滿笑容，會客室裏歡聲歷久不息，使我留下不泯的印象。除了談些時事及一年來亂離中逃難經過情形外，對於我們的居處是否已佈置妥貼，家庭間的生活情況，均承王伯羣、歐元懷兩師殷殷問及，使我有「如歸」之感。

感念故人不禁愴然

除了對負責的首長作禮貌上的拜會以外，內部有關連的幾個重要同仁，也少不了要去走訪一下，因此我到太夏以後曾去看過訓導長與各學院長。其中以教務長吳澤霖博士夫婦，我要特別介

紹幾句，因為吳夫人陸德音女士是我當年在校讀書時的同學，我去法國以後，她則留校任助教，她學問好，生得美麗大方，性情賢淑，是大家心目中的賢妻良母型人物。在她任助教期間，適吳澤霖博士歸自新大陸，由學校聘為教授，少年英俊，又富才學；吳既未婚，陸乃女生中翹楚，經歐師元懷極力撮合，遂成美滿良緣。他們夫婦服務大夏十餘年，直至遷校貴陽，迄未離開。其間陸姊曾去美深造一年，返校後一直擔任英語講席。我自法國歸來以後，即與彼夫婦往還不絕，友誼深厚。此次我來校任教，老友重聚，歡逾平生，昔日同窗，今又同在母校共事，當此亂離之年，更屬難得。吳博士已升教務長，與我夫婦無論在公私方面接觸特多。我在筑任教數年之間，雙方如通家往來；惜陸姊於民國廿九年去世。吳澤霖為國內社會學名家，與當年清華名教授社會學家李達齊名；卅八年大陸撤退時，吳博士任教清華為公私所羈，未及逃出，誠為我學術界一大損失。我到臺後因素知前勵志社總幹事後任駐巴拿馬大使黃仁霖，與吳兄有深厚交誼，每遇見黃仁霖時，常談起吳兄，均嘆惜其不幸陷身魔窟。黃仁霖告我據傳吳兄在平被中共折磨，令其掃街。感念故人，為之愴然，生死莫卜已多年矣。

我在大夏任教四年，除了憲法和國際公法每學期必開，且必為我所授外，其他如政治學、外交史、國際私法、行政法、破產法、土地法、保險法等數門，隨時在交替開講。因這幾門課程，有一年授完的，也有半年（一個學期）即可授完的；有時來了新的兼任教授，必得將就他們，先

要把他們所欲講授的課程開了，然後才輪到我自己選擇或決定。因為兼任的教授流動性大，隨時在更換；雖然，學校在原則上是針對需要而延聘；換言之，那一門課程無人教，才去物色能教此一門課程的師資；但戰時的貴陽，非平時人才薈萃的京滬平津可比，一時要找到合格的教師，十分困難。大夏法律系除系主任徐漢豪兄外，唯一的專任教授就是我，其他均為兼任教授或講師，那時很少聽見有副教授的設置，而我們大夏法律系所聘到的上述兼任教授，多數都是貴陽的「貴州高等法院」的法官；他們有的是碩學之士，早已具有法官資格，從事司法實務經驗多年，兼任功課，游刃有餘；但有的僅有虛名，教起書來，土音太重，口齒不清。他們以職務為主，教書為副，隨着職務的調動而辭去教職，使得法律系主任隨時在為覓聘新的講師接替而傷腦筋。有時「青黃不接」，或新來的兼課者不欲擔任某一門課程，校方祇得將就他，而將那一門課程落在漢豪或我的肩上。大夏係私立，固然為了省錢而不欲多聘專任，同時也是為了貴陽地區邊遠，又加上戰時情形特殊，不易羅致較多的人才，此種困難情形，在戰時後方各地的學校中，均可能發生的。假如貴陽不是省會，沒有一省的高等法院存在，學校勢必向外地如重慶市人才多的地方去延攬幾位專任教授來校。為了有高院的許多資深法官在此，可以就地取材，請他們來校分別擔任一些法律課程，就樂得省錢省事，一樣把課程問題解決。所以學生們除了分別向各課業師受業請益外，平時接觸較多的是漢豪和我。我到校次年，某

次開法律學會（各系均有此種研究組織），在會畢隨便談笑的餘與節目裏，有人說：「我們法律系有如一個家庭系，與我們接觸最多，在學問上和做人處世上給我們指導最多的兩位專任教授又是夫婦，在情感上、精神上恍如父母子女般的關切。……」因為兼任教授們均另有專職，為時間所限，輒於課畢離校，學生們遇有功課上的疑難，或個人方面的困惑，常來向我們討教或要求幫助，師生間自易增進較深的了解與情誼。

同仇敵愾嘉惠學子

法律與政治這兩門學問，大家都感到沉悶枯燥，不若文學藝術來得活潑，能够引人入勝；但是講解的人，如能用深入淺出的方法，再加旁徵博引，善於辭令，一樣能令學生感到興趣。尤其是政治課，隨時為之剖析時事，使學生對國事及世局有更多的認識了解，最能滿足青年人的求知慾。當時正在對日抗戰期間，國內外的局勢隨時都在變化，每日都有新奇的大事發生，作老師的人能够幫助他們作更多更深的分析，正是關心國事的熱情青年所愛聽樂聞的。回憶我當學生時的心理，及對老師的敬愛程度，有高低深淺不同的因素，自己今為人師，在傳道方式上自當有所取捨而知所自勉了！常聞人言，許多不受學生歡迎的老師，並非由於學問不够好；不懂教授方法和不善言辭，也是原因之一。

當年號稱「程序法」的「刑事訴訟法」與「民事訴訟法」，均由那些作法官的兼任教授擔任，因為他們作法官多年，對於訴訟程序有實際經

驗，教起來比較熟悉。漢豪在課外兼作律師，亦是熟手，所以他遇必要時，也擔任這類課程。唯有我始終教「實體法」方面的法學課程，對程序法全屬外行，故從不涉及有關這一部門的功課。我在廈門大學時，還開過「國際政治」一課，內容頗多涉及時設在日內瓦之國際聯盟，在戰前京滬各公私立大學法學院均開出此一門課程，在當時亦為事實所需要。我在廈大授「國際聯盟」，亦覺順利易教，因我在法國當學生時，國際公法教授拉路赫爾氏即常講解「國聯」達數週之久，最為精闢。我與漢豪畢業後返國時，曾遊瑞士日內瓦，參觀國聯，携回不少資料，漢豪曾翻譯數篇有關國聯的文章，刊在雜誌上。我倆對於該一國際機構，無論在理論或實際上，均粗知一二，待自己講授此一課程，自覺輕易。惟抗戰後在大夏，我們已不開此門功課，因是時國聯已名存實亡，對國際政治毫無影響。日本侵華，國聯所遣派李頓調查團來我國調查後所作成之報告書，形同具文，世人對該一組織，日漸感覺失望；到軸心國家德、意陸續在歐肆虐，國聯面對侵略勢力，毫無作為，終至「壽終正寢」，而由舊金山會議後所產生之聯合國取而代之。其奈聯合國演變至今，又蹈國聯覆轍，說來話長，令人感慨系之！

大夏在上海時，學生數千，因受戰事影響輾轉遷徙之故，遷到貴陽時，已少了大半。開始復校時，既有本地籍學生紛紛入學，又有淪陷區的學生陸續要求轉學借讀，此一現象，在當時後方的各公私立大學所在皆有，於是各大學因播遷而失散的學生，又因新來者而補充不少。以大夏法

律系而論，即有百餘人之多，學生的籍貫分佈各省，後來許多學生因家鄉淪陷，均受政府的公費津貼，未曾因家款中斷而輟學；此一公費政策，實為抗戰期間政府嘉惠青年學生的一大德政，使青年免于流離失所。至今，我在臺灣還隨時遇着許多中年人士，談起他們在抗戰期間受到政府的照顧才有今日，他們不但幸運的度過了一段青年時期的大難，也完成了學業，在私能自立，在公為國用，國家雖然耗費了公帑去維持公費生，總算為國儲材，保存了國家的元氣。

這批隨戰爭流亡在外的莘莘學子，有時衣履飲食皆成問題，在我們老師的眼裏，也感到值得同情，自己也有子女，將心比心，不論多寡，盡量給他們一些照顧。有些教授為清苦學生們設法尋找獎學金的機會，有些教授於薄俸中抽出若干，隨時借助學生作為獎學資金。我也濟助了四名學生，在我個人，不影響生活，而對學生，則裨益就大了。總之抗戰時期大家同仇敵愾，人間有溫暖，處處充滿人情味。

日久情生愛屋及烏

另一現象，是我早在成渝各大學就曾見到過的，從京滬漢等地來到後方的流亡學生，他們來到後方比較落後地區轉學或借讀，初到時很不習慣，甚至對後方的學校設施及同學，彷彿都看不順眼。他們或她們常於有意或無意間顯出幾分驕氣，似乎感到委屈，甚而口出怨言；時間稍久，知道實逼處此，也莫可奈何，漸漸地收斂了那股驕矜之氣，安之若素與人共處了。正如城

裏人瞧不起鄉下人，一旦自己久居於鄉，淡忘了城市生活，也很自然的染上幾分鄉氣，大家觀感上的差距無形中就會消滅了。況且戰時的大後方無論在那一方面，莫不是日漸進步與繁榮，不止是青年，連那般中老年人，由初到時的不習慣，變成「日久情生」，對於所在地的「人」、「事」、「物」也喜愛起來，迄勝利後離開時，還依依不捨，而今在臺灣還有不少人談起當年在重慶的日子，為之嚮往不置呢！我到大夏一月左右，已是大考，接着就放寒假。在一個月的假期中，又逢新年，同仁間免不了往來應酬。我雖是個新來者，但漢豪已先來將近一年，與校長以下的同事們處得相當熟悉了，在行客拜坐客的習俗下，我應該到尚未拜訪過而又與我夫婦處得很好的同仁家中走走，因此了解不少各家的情况。

王伯羣校長的故事

首先是校長王伯羣，他的弟弟王文華，是革命元勳，曾任黔軍總司令。他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當我早年在重慶肄業時，他是本校的校董會主席，我們就深知他是革命元老；後來我去海外留學以及回國做事，時時在報上看見他的大名，顯示着他在政治上的活躍與升遷。當我於民國廿年多返抵國門，下榻在上海三馬路滙中旅館時，翻開報紙，正看到他與保志寧女士的結婚消息；那時他是國民政府首任交通部長，他的私人動態甚為社會人士矚目。當時小報風行，對於他的婚事作種種渲染，有些小報加鹽加醋，說王部長家有妻室，也有說付愛情保證金若干萬等，十分荒誕離

譜。朋友們的談話，也七嘴八舌，傳說不一，有附和流言的，也有大罵報紙造謠生事的。我曾一度肆業大夏，自表關懷，遇見昔年大夏老同學時，順便問問，他們都說：婚姻是正經事，本不須大驚小怪；要人的婚姻就不同了，如果其間稍許有點特殊之處，新聞記者尤以一些無聊的小報藉此大做文章，用些迎合社會趣味的流言，亂寫亂登，以謀推廣銷路，其實事件的真相，完全不是那回事。但凡社會新聞，在一陣起鬧後，便煙消雲散。到我此次回校任教，與王校長伯羣師及夫人保志寧女士多次往還，歷久相處，方知他們一家生活的實際情形，絕無當年報章騰載的種種情事。王夫人除相夫教子以外，還從事各種社會公益事業，抗戰期間蔣委員長夫人發起並倡導的兒童保育會，廣收難童，安置教養，各省設立分會，均由當地重要首長夫人領導。貴州省保育分會會長，即由保女士擔任，下設保育院若干，不但使失家的兒童有所歸、有所養，還接受教育，使其成人自立，並為國用。保女士出錢出力，不辭辛勞，每日到會辦公，隨時帶同會中職員赴各地保育院視察院務，指示應行與革事宜。我在大夏任教四年期間，利用課暇，從旁為她幫忙，自覺也是個人為國家盡些戰時義務，其間曾一度擔任保育會貴州分會的副會長，並長期擔任院務管理委員會的主任委員，除平時每週往會辦公一兩次外並多次陪她出去視察各保育院，便中我們也享受到日間同遊山水，夜來連床共話的樂趣。她和我最緊張而印象深刻的一次出發，是會中接獲急電，定番保育院發生塌樓事件，員生有數人受傷

，請速前往處理，戰時的後方交通原就困難，急忙中坐了王校長的車長途開往發生災變之保育院，見受傷員生數人，為之惻然。小地方祇有衛生所之類醫療機構，會同院方及地方人士商量救治，幸傷勢均不嚴重，平時各保育院均備有普通一般所需藥品，療治上尚無多大困難。我們在院中住兩夜三天，督促一切，總算度過難關，返回貴陽。各院教職員工深體戰時物資艱困，均能在待遇微薄，生活簡陋中勉力服務，各秉良知，為抗戰建國盡一份職責。志寧和我還兼了省垣其他幾個婦女團體如吳主席鼎昌夫人所主持之婦女工作委員會及全國反侵略大會貴州分會……等民衆團體職務，當時民氣高昂，人人以能為抗戰建國盡一份義務為榮。王校長以中央政府大員之尊，同時在自己家鄉貴州盡瘁教育事業，作育人才，將一個內遷的大夏大學，苦撐中成爲一所後方有名的學府，不幸王公於卅三年在渝逝世，竟不及一見勝利光輝及全國同胞歡騰景象，憶其數年奔走瀛築道上，參與中樞大政，兼顧貴州校務，操心紛繁，積勞成疾，一病不起，自為親故同深悼惜，遺下結稿僅十有二年伉儷情深之孀妻保志寧女士，哀傷逾恆，情何以堪。

保志寧美麗又賢淑

保志寧女士美麗賢淑富有才華，向為識者所稱羨。良緣苦短豈真紅顏薄命？勝利後在復員還都聲中，保女士携同一子三女先離筑，移居重慶，候機東下，時本人已在抗戰八年中之後四年，早來重慶，服務於位居上清寺陶園之審計部，恰與

志寧姊居處近在咫尺，深交久別，欲語萬千，或於公暇往訪或結伴出遊，傾談小飲，互解客愁。時保伯母歸自美加，伴女同住，相依爲命，每見我去款款親切。某夕同在階前乘涼，志寧姊入厨指點女傭開飯，保伯母趁便對我說道：「她才三十幾歲就居孀守志，實出意外，我看見她母子們遭此大變，實感傷心，今後局勢難料，回上海舊居，恐怕還有問題，我看你是她朋友中最相好最談得來的一個，望你以後多多安慰她照顧她……」

一言下兩眼含淚；我也凄然。立告伯母請她老人家放心，我們既然相交有素，以後彼此間自會隨時互相照料，老人和我一樣，知道志寧是位堅強能幹的人，今後自會照顧自己以及子女們，必能將這個家撐持完好如往昔，但在一個慈母的感覺上，睹此情景，總是有些牽掛的。保志寧女士的父親爲外交官，雙親常居海外，大弟駿迪一向在國外求學，二弟祥麟隨姊在筑肄業大夏，三弟紫辰跟隨父母。民國卅一年駿迪博士自美新歸，被聘到大夏任教，正巧繼我之講席授課，我因家母弟妹均在重慶，久欲回川侍奉團聚，蒙于院長右任派在審計部工作，故即辭去大夏教職，帶着「去猶忍淚」的心情離開大夏師友同學。與駿迪老弟交雖未久，幾度晤敘，深感契洽，當即於臨別前將課務交代清楚。保夫人葉美媚女士爲加國華僑，美麗賢淑，初次返國，交談時雖不能暢所欲言，但伊人聰穎，能說國語不少，我亦略知英語，我二人間尚可充份互相表達意願。勝利後保博士轉任外交界，不久外放，十餘年後，始在臺重逢話舊，倍覺親切；旋又經過兩次外放後回部

工作，我們間時聚時散，友誼不渝。他倆最初給我們的印象是新婚不久的女貌郎才，神仙眷屬；歲月不居，大家又過了將四十年，我已衰老，而彼倆仍屬青壯。駿迪弟爲優秀的外交官，夫人持家有道，應付事物精明能幹。夫婦情篤如昔，待人對友週到親熱，令人感羨。

抗戰勝利次年，我搭審計部復員的飛機飛回南京，即去普陀路八號看保志寧女士。她先我還都，已安好了了一個園庭幽雅，內部設備周全的家庭，比起我們初到尚無居所，連公家還租住民房辦公，個人寄住宿舍，生活雜亂未上軌道就完全兩樣。審計部女職員的宿舍是一棟石庫門的衙堂房子，我的舖位在一個七八人合住的大敞間，僅有的行李是自渝携回的箱子放在床下，裝的無非換洗衣服。八年抗戰，我僅有的積蓄是平時從清苦生活中節省下來的幾樣小金飾，合共不到五兩，大家都不敢置於床下箱內，携出寄存親友家中。我也將那幾件算作「財產」的「寶物」拿去，交託志寧姊保管，她家隨時有人看家，不會遭遇盜竊遺失。以今天臺灣經濟繁榮，家家生活寬裕的眼光看來，當時那種窮兮兮，生怕「失去財富」的心態，也够寒慄了！然而，我認爲可信賴的人還是她！憑這件小事，可證我心上有什麼，立刻就會想起她。勝利後，有人——尤其接收大員——得意忘形狂歡作樂，種種不法，害公害己，而一般守正不阿的公務員與善良的老百姓經過了八年的苦難日子，一旦勝利還都，彷彿出了一口惡氣，多不免也找親友聚飲借遊，偶爾也小飲三杯，一展胸懷。我和志寧姊在京還既多，有關

彼此的家庭瑣事，生活細節，以致國局世事，人生哲理，皆爲我們樂共情趣的話題，正如與其他朋友初回京時同吃小館子一樣，最愛點一盤炒蝦仁滿足口福，這是去後方八年所不曾吃過而爲大家所懷念垂涎的珍饈，幾處值得參觀留連的勝景名剎，大約也有我們的足跡。可惜京華盛況太短了，不旋踵狼煙四起，砲聲驚醒了大家的美夢，使正在爲國事奮發，對前途懷着無限希望與光明的中華兒女，又骨肉流離，含淚告別大陸的美麗河山；避秦南來，迄今三十餘年，我朝野上下埋頭苦幹，朝着消滅暴政重整家邦的目標奮鬥。志寧爲兒女學業等問題，於三十七年多先我離京，我夫婦在三十八年二月京畿局勢緊張中自上海乘海輪輪來臺，萬幸未搭兩天前自滬開出在上海遇難翻覆沉入海底，旅客死亡數百人之太平輪。逃過大劫，至今思之，猶有餘悸。抵此不久，即與志寧姊見面，小別不過兩月，話及國事與個人變化之大，比之重慶別後南京相逢時之心情迥然不同，相對唏噓。幸好夫兄漢雄早於臺灣光復後到此服務紙業公司，任會計處長，已有一個安定的家，供我們逃來時落腳。回憶抗戰勝利，來得突然，我們飽受戡亂之苦，一朝歡天喜地回京，却一時無法安定，但此番安定中再作流亡者時，反於抵達目的地立刻不愁居食問題，深自慶幸。

一次難忘的歡迎會

我和志寧姊均屬南來避難的幸運者，彼此生活粗安，也常一同出街小吃玩玩採購衣物，繼續享受如過去在貴陽、重慶、南京時良朋把晤的溫

暖友情，她在臺北住了不久就携同子女移居美國，伯羣公在黔所有產業，全陷大陸，保女士於逃離時無法變賣携出，手中縱有小數，在經過渝京臺三度搬遷，數載生活耗用；一家五口連同子女學費又難維持多久？抵美後保女士即在一家百貨公司覓得一份會計工作以維生計，並將子女教育成人。婚嫁就業等做得恰到好处，盡了一個含辛茹苦的寡母責任，也對得起丈夫在天之靈。中美雖遙，在她與我不斷的通訊中，得知她居住紐約附近之長島多年，兒女讀書做事，多半在外，祇星期假日輪流歸省，伴慰母親。平時她獨居一大院落，不畏寂寞。

去國廿餘載，十年前曾歸來一次，住在至親何敬公（應欽）伉儷府上，大夏旅臺校友聞訊，無不欣然，曾為她舉行了一次盛大而令人難忘的餐宴歡迎會，借立法院貴賓室作會場，由大夏校友立法院院院長文亞主持，並致歡迎詞，校友到者百餘人。保女士既為校長夫人，又屬畢業校友，彼此均為舊識，自為會友所樂見，無不以熱烈歡迎的心情與她握手話舊，大家見她年近花甲，望之不過四十許人，風采依然，可知養生有道，贏得衆口稱譽。她的答詞，以清亮的口齒，誠懇的態度，簡述旅美期間為生活及子女教育苦撐經過兼及伯羣公一生志業盡瘁教育愛護學子等辛勞往事，聽者為之動容。她住此兩週，又回美國，其間曾赴曼谷晤弟並為葬在該地之慈母掃墓。

老友重逢倍覺歡洽

我夫婦於六十八年秋往遊美加，於紐約親戚

處先以電話與她聯絡，雙方聞聲大喜，並約定日期往訪，與在車站迎接的她相擁為禮，老友重逢，倍覺歡洽，我們告訴她真不敢相信能在古稀晚年實現了遊歷新大陸的素願。她獨住一座二層樓房，上下廳室數間，均佈置得精雅合宜，屋外四週草地如茵，花樹清幽。子女均不在身邊，不怨孤寂，不畏盜竊，她的膽量大，勇敢堅強，實在令我訝異得萬分佩服。我這弱者是愧不能及的。她雖獨居，但每逢星期假日，子女必輪流來探候侍奉；日間澆花除草整理家務，詩書常伴，自得其樂。那個小鎮叫長島，附近祇有兩三家中國人，互相走動照應。一家是臺灣光復初期蜚聲醫界的放射專家吳靜教授號清源，這位大夫我們初到臺灣曾去領教過X光照射；另一家為昔日在上海相當出名曾選到臺北繼續營業過一段時間的華美藥房主人徐濟華、錫華姊妹兩位女士。我替志寧姊高興，異國遇同胞有似親人，巧遇就算幸運，況兩姊妹均為大夏校友；可惜我的停留時間不多，未及趨訪吳徐兩府，感到歉憾。

我與保女士兩天長談，接受她的盛意招待，再陪同返回紐約，由她的四女德齡小姐在站等候，購票進入名震遐邇的無線電城觀賞歌舞。幾幕驚奇變幻五彩繽紛的獻演，我不知道用什麼形容詞來表達，祇得說太宏偉太瑰麗了。走出該院，復由志寧姊和她那親切懂事的教授女兒，開車同往博物館參觀，其中精品甚多，歐美名畫、中國古瓷最足欣賞，後來又轉到被譽為世界最高層之一〇七層「世界貿易中心」，到了這裏的人，難免不變成初入大觀園的劉佬佬，居高

俯視，驚嘆得顯出幾分土氣與傻氣了。幸我們是早年就登過巴黎鐵塔的老遊客，從頂峯看過大地的人豆馬寸，才不致於大出洋相。上午招待吃了飯，這時又像坐飛機，在白雲飄過窗外的空中飲咖啡。悠閒環坐的我們，也享受了「仰觀天象，俯察山川」的情趣。人生幾何，能忘形物外的時刻也不多的。德齡五歲隨母去國，完全受的美國教育，照那些同樣情況的華僑孩子，可能一派洋化，與我們會表示得格格不入；可是她的言談行止為人處世仍符中國傳統美德，衣着樸實無華，辦事精明幹練，對母親孝順有禮，對社交長者如我倆老人殷勤款接，親切伴談給我們留下出乎意外的好印象。她已得了博士學位，任教大學，良好的母教加上她本身的學養及努力，始有今日的事業成就和令人嘉佩的風範。自美一別，瞬逾五年，綜合我對她的觀感，她是出身外交世家的嬌小姐，一出校門就成為部長夫人，年輕美麗被大家目為生活在富貴之中，又曾負過「校花」之名，照說她必定是位講享受愛打扮的貴婦型人物；但自我在貴陽認識她，未見過她於平時出街前特別化粧刻意修飾，祇要身上的衣服整齊，拿起皮包說走就走，清淡隨和與普通婦女或公教人員一樣出自本色。對人亦寬厚平和，並無驕奢傲慢習氣，她生活的前一段是幸福的，離開大陸後，與衆無異，或多或少也會遭遇到艱困磨折。一位失去了丈夫的單身女性携帶教養四個孩子，够她受的，幸她能幹堅強，子女均有成就，旅中生活日益佳順。心地善良的好人，志寧姊祝你晚福多。

（未完待續）